

# 清季教案量化研究的開拓之作

## —讀《清季民教衝突的量化分析》

趙潤生 趙樹好\*

### 提 要

計量是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對教案研究尤其重要。陳銀崑用計量方法研究1860~1899的教案，體例新穎，論述翔實，對於教案的分期、空間分布、與傳統文化之關係案，尤其有其獨到的見解，儘管文中難免有些許缺陷，但仍為研究清季教案史乃至整個中國教案史提供一個值得參考的藍圖。

**關鍵詞：**陳銀崑、清季教案、文化衝突、量化研究

清季教案始於一八四四年的浙江定海教案，終於一九一一年的陝西長武教案，是中國近代史上極其重要的歷史事件。其中，一八六〇—一八九九年間的教案比較集中，影響也較大。本文評述的陳銀崑著《清季民教衝突的量化分析》（一八六〇—一八九九，以下簡稱陳著）一書分析研究了這一時期的教案（注一），它的問世，對於科學地認識此期教案，無疑具有重要價值。

自清朝末期起，國內外許多學者就開始研究一八六〇—一八九九年間的教案。本世紀七十年代初，台灣學者整理了清總理衙門有關教案的重要檔案—《教務教案檔》，開始深入研究清季教案史。以八十年代初期起，大陸學者也掀起教案熱。經過數十年努力，國內外學者們發表和出版了大量論著，但這些論著基本上都局限於某個事件，某些區域和問題，或對整個十九世紀教案作一般性論述，只有少數定量

---

\*趙潤生，山東聊城師範學院講師。趙樹好，山東聊城師範學院副教授。

研究的文章（注二），尚無人對十九世紀六十一九十年代的教案進行系統地量化分析，陳著可以說是填補了這項空白。

與其他教案論著相比，陳著具有鮮明的特色：

首先，體例新穎。陳著採用計量歷史學方法，通過大量數字、圖示（共用四七個圖、表）及深入地分析研究，全面探討了十九世紀六十一九十年代教案的重要問題，如教案的起因，發展階段、分布特點，教案與近代外交的關係，民教衝突的方式，教案與傳教活動的關係等問題，開創了全面科學地研究清季教案史的先例，具有重要意義。

其次，論述翔實。陳著利用豐富的資料（包括八二種中文資料和四五種英、日文資料），採取史論結合，夾敘夾議，論從史出的寫作方法，進行了獨創性的研究，避免了使歷史概念化的缺陷，給人以信史的感覺。

再次，陳著對許多問題的認識都有所突破，提出了不少新穎的見解：

第一，有關十九世紀六十一九十年代教案的分期問題。對於這一問題，以往的學者們主要提出三種不同的觀點：（一）二階段說，即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幼稚階段），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比較成熟階段）；（二）三階段說：一八六〇—一八七〇年、一八七一—一八九四年、一八九五—一九〇〇年；（三）新三階段說。一九八九年，有些學者又提出了新的三階段分期法：一八六〇—一八八四年、一八八四—一八九四年、一八九四—一八九八年（注三）。上述觀點主要依據反洋教鬥爭領導成份的變化而定，即前期由官紳擔任領導，後期官紳逐漸退出鬥爭舞台，會黨取而代之。我們以為，上述觀點都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如果這樣，在甲午戰後至義和團運動期間，地方上山東巡撫張汝梅、李秉衡、毓賢（後改任山西巡撫）、江西巡撫松壽、直隸總督裕祿，中央的載漪、剛毅、徐桐乃至慈禧太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和慫恿義和團的反教活動，又該如何解釋？陳著通過系統地量化分析，以列強侵略的加深所引起的教案數量變化為依據，將十九世紀六十一九十年代的教案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一八六〇—一八七四年。在這一時期，清廷在列強的壓力下全面解除教禁，允許外國教士進入中國建堂置產，傳教事業迅速發展，教案隨

之增加。據陳著統計，這一時期教案數量為二八四起，每年平均十八點九起（注四）。第二階段，一八七五—一八八四年。一八七五年中英煙台條約簽約，允許英人進入甘肅、青海、西藏等地游歷，從而保障了外人在內地的安全，促進了傳教事業的發展。此期英、俄等國加緊侵略中國，擴張在華勢力，法國又於一八八四年挑起中法戰爭，東南沿海數省受到波及，反教鬥爭蓬勃發展。這一時期教案總數為一九九起，每年平均一九點九起。第三階段，一八八五—一八九九年。由於清政府的軟弱無能，致使中國在中法戰爭中不敗而敗，喪失許多權益。接著，中國又在甲午戰爭中敗於東瀛“小夷”日本，列強群起效尤，掀起瓜分中國狂潮，某些教士教民恣意妄為，橫行不法，民衆反教活動更加猛烈，此期教案總數多達三二八起，每年平均二一點九起（注五）。這種分期方法避免了以點代面，以偏概全，想當然的做法，是較為科學，令人信服的。

第二，關於教案的分布特點問題。此前，學術界對教案分布特點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以為，“在資本主義侵入較早，影響較大的通商口岸及沿海各省，雖然也發生過反洋教事件，但是遠不如偏遠、閉塞的雲南、四川激烈，這是因為在沿海地區已經出現半殖民地性質的城市，而在內地，封建勢力則比較濃厚，資本主義侵略者所遇到的阻力是強大的。越是在閉塞、落後的地區，遇到的反抗就越強烈”（注六）。這種觀點因沒有建立在系統量化的基礎上，與事實相去甚遠，基本上是錯誤的。另一些學者通過對清季教案的統計分析後指出：邊遠地區（東北、甘肅、蒙古、西藏、新疆）教案少，內地（即其他地區）教案多（注七）。這種觀點雖能反映一定問題，但失之籠統。陳著則指出沿海省份（奉天、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台灣）教案最多（共三九三案），沿江省份（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次之（共二六八案）、內陸省分（河南、陝西、山西、貴州、雲南、廣西、甘肅、吉林、黑龍江、蒙古、西藏最少（共一五〇案）（注八），這種分期方法更加具體明確，較為妥當。

第三，教案與傳統文化的關係。這一問題歷來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陳著則提出了與眾不同的觀點，即“外來文化與本地文化接觸的頻率，與本土運動（指

教案一引者)發生與否,有很大關係。一般而言,有運動的地區較無運動的地區,與外來文化接觸較多,但若過於頻繁,亦不會產生運動”(注九)。這就是說,發生教案的地方比沒有教案的地方民教間的交往要多,但如果民教交往過於頻繁,教會因其橫行鄉里而一再受到打擊,不得不變得檢點些,中國百姓也因反教而屢遭鎮壓,元氣大傷,同時對教會也有較多的了解,避免了誤會,就不再反教。這一結論是依據大量資料,通過系統量化而得出的,令人信服。陳著進一步指出,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衝突的原因,一是“教士成爲侵略性西方之一部份來華,仗著優越之軍事力量,從中國奪來之協定“(注十)。“從未想到尊重異文化的風俗習慣”(注十一)。這樣,中西文化衝突一開始就以不平等的方式出現,“此方式使國人感受其壓力,試圖保存固有文化,而發展出反教運動之對抗”(注十二)。二是由於“異文化的適應問題”。由於本身文化的優越感,外國教士認同的仍是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多持逃避態度,躲入所謂“教士群居之處,過著熟悉的西式生活,扮演著異文化中陌生人的角色“(注十三),而他們接觸的只是文盲半文盲的中國信徒,因此教士對於中國文化的認識,亦來自這批人,“結果產生對中國的意象有所偏差,使其鄙視中國文化之迷信與無知。肯定本身文化的價值,更因之以決定以全盤移植方式來介紹西方文化習俗”(注十四)。外國教士依仗強權和不平等條約來華,無視中國傳統文化之事是人們所熟悉的,至於教士的上述活動特點則鮮爲人知。陳著所揭示的這種特點,開闊了人們的視野,有助於推動這一問題的研究。

第四,陳著通過對十九世紀四十年間反教運動的檢討,深刻地闡述了一個國家或民族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問題,即“不僅保持自己之優點,更不斷接受外來文化之優點,綜攝其精華,進行創造,方爲正途大道。一味的拒斥或全盤模仿,均非所宜“(注十五)。這一結論,是此期國人反教鬥爭血的代價換來的。在此期間,參加反教的官紳士民狂妄自大,盲目排外,拒絕學習外國的一切先進事物,以血肉之軀和原始落後的武器與列強堅船利炮保護下的基督教會相抗衡,不能不一敗再敗,故這些教案幾乎都以“懲凶”、“道歉”和賠款而告終。歷史的悲劇不能重演,在我們民族今天的發展建設中,一定要記取這個教訓。

我們在肯定陳著優點的同時，也應看到它有某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陳著以爲“還堂糾紛，屬於交涉性質”，故該書第十八頁的〈民教衝突特質時間表〉、第二一頁〈教案波及面積表〉、第六一頁〈民教衝突行爲方式表〉及第一五八頁〈政府對民教衝突措施表〉中均未將此類案例列入計算。筆者以爲，這種觀點是欠妥的，因爲教案係指基督教與中國官紳士民之間的矛盾鬥爭而言，交涉中也包含著矛盾鬥爭，況且還堂案也並非全是交涉，不少教案中亦有鬥爭。比如在一八六一—一八九五年河南南陽還堂案期間，南陽紳民曾多次張貼揭帖，反對天主教會。一八六八年十月間，南陽百姓還“沿街挨門撒帖造旗，邀聚府城隍廟局，演戲設席，議定三、五日內，誓要尋殺逐趕天主教”（注十六）。南陽紳民的上述活動，不能解釋爲單純的交涉。再如一八六二—一八六四年的重慶還堂案期間，當地紳民曾開展大規模的打教活動。據法國教士范若瑟呈訴，反教紳民自崇因寺出發，先至姜家巷，將范若瑟的主教座堂真原堂打毀，搶走祭器、書籍、銀錢、衣物、契約以及川黔滇藏四省寄存貨物，打毀四鄰教會公館、學堂、病院、育嬰堂等十八處地方，接著又抄掠教民七十餘家，毆斃教民一人，傷數十人（注十七）。重慶紳民的上述活動，無疑是尖銳的鬥爭，更不能算作交涉。

陳著把教民之間及天主、耶穌教之間的矛盾鬥爭都算作教案，亦值得商榷。我們以爲，這屬於教會內部鬥爭，而非教案（注十八）。陳著從八八一起教案中分出九九〇個原因，這也不太合適，最好從每起教案中找出一個主要原因，這樣才便於量化。陳著書末未附八八一起教案的簡況，這是很大的缺陷，如果附上，則比單純的數據和圖表更有說服力。陳著對大陸學者的成果吸收的太少，特別是對文史資料用的更少（陳著只用了〈近代史資料〉一九五四—一九六五年的內容，而對其他年份及各地文史資料則根本未用），故陳著所統計的教案數字尚不完整，十分令人遺憾。陳著說河南南陽還堂案長達三六年，這也是不確切的。據〈教務教案檔〉第一一五輯河南教務記載，該案始於一八六一年七月，終於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按整年計算爲三四年，按年頭計則爲三五年，而非三六年。陳著盡管有上述缺陷，但從主要方面來看，仍不失爲一部清季教案史的力作。

計量是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對教案研究尤其重要。陳著作爲用計量方法研究清季教案的第一部專著，將爲全面科學地研究清季教案史乃至整個中國教案史提供一個值得參考的藍圖。

### 註釋：

- 註 一：陳銀崑著：《清季民教衝突的量化分析》（一八六〇—一八九九），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八十年九月初版。以下簡稱陳著。
- 註 二：王樹槐：《清季江蘇省的教案》，林文慧：《清季福建教案論述》，載《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4)教案與反西教、趙樹好：《近代教案規律淺析》，載《學苑采英》，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等。
- 註 三：《社會科學戰線》一九八八年第一期、《社會科學研究》（成都）一九九〇年第二期。
- 註 四：陳著頁十六。
- 註 五：同上。
- 註 六：《鄭州大學學報》一九八七年第四期。
- 註 七：《學苑采英》。
- 註 八：陳著頁一九。
- 註 九：同上，頁二九。
- 註 十：同上，頁二〇六。
- 註十一：同上，頁一八六。
- 註十二：同上，頁二〇六。
- 註十三：同上，頁一八〇。
- 註十四：同上，頁一七四。
- 註十五：同上，頁二一二。
- 註十六：《教務教案檔》第二輯，頁五四一。
- 註十七：同上，第一輯，頁一一七七—一九一。

註十八：趙樹好：《清末天主教和耶穌教在華鬥爭初探》，載《聊城師範學院學報》一九九四年第二期。

# **Towards a Quantification Research on the Religious Crises of the Ch'ing Dynasty:**

## **An Analytic Reading of A Quantification Analysis of the Religious Crises of the Ch'ing Dynasty**

Zhao Ruen-sheng

Zhao Shu-hao

### **ABSTRACT**

Quantific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methodologies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especially for the research on religious crises. In his studies on the religious crises of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1860-1899), Chen has justifiably adopted such a methodology, which ha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both the periodization and the geographical divisions of the religious crises and a better know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ises and the tradition. Despite several shortcomings in his arguments, Chen's book, as a whole, has set a quite good example for researching the religious-crisis development of the Ch'ing Dynasty and of the whole Chinese history.

**Key words:**Chen Yin-khun; Religious crises in late Ch'ing; Cultural confliction; Quantitative research.